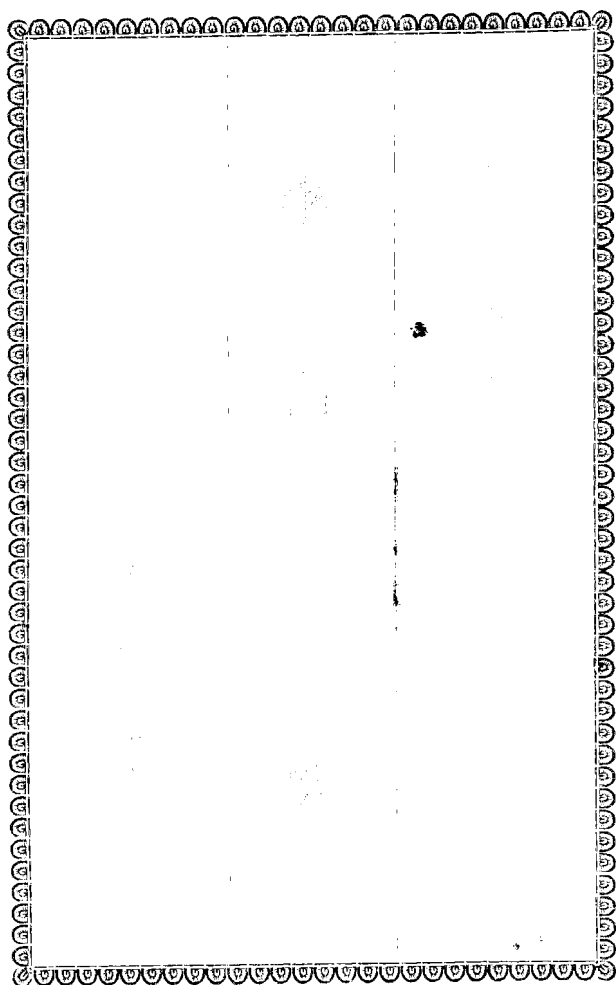


李白研究

卷一





有 版 權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版

李 白 研 究

作 者 李 守 章

發行處 上海新宇宙書店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1 9 3 0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整理及估定價值之標準——李白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李白詩的特質——各家對李白詩的評判——自己的意見

第二章 李白詩與其環境

李白詩與地域的關係——李白詩與自然界——李白詩與當時政治

第三章 李白與歷史詩人的關係及影響

李白詩的驕傲性——歷史文藝給予李白的影響——李白詩背景的刺戟與

並時作家——李白死後的李白詩之影響

第四章 李白的世系及其年譜——後記

第一章 導論

整理及估定價值的標準——李白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李白詩的特質——各家對李白詩的評判——自己的意見

一

中國從一九一八年的五四運動以後，在思想上文藝上都起了一個極大的變革。這時在時代前線上的智識份子，不獨致力於介紹國外的各種思潮以及創造新的藝術；便對於國內舊有的思想以及文藝，也用力地做了極多的考據和整理的功夫。這一個進展跟隨着新的政治的進展，一直到了一九二五年，纔慢慢潛伏下去。但到了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國內的政治突然緊張，各階級間的軋礫益形尖銳，而文藝界便隨着這紊亂的政

治局面而益形混亂，於是便生出了各種不同的文學論。他們——雖然他們本身與其生活俱屬於小有產者——但他們目擊着這社會上森然對峙的兩大階級（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便不得不自尋門路，『賣身投靠』了。在這其中有各走極端的兩種文學者：一派是目光投到未來的，以為只有未來的階級文藝是存在的，其餘的文學似乎應當打倒；一派是迷戀於過去的，他們表面說文藝是獨立存在的，與政治思想沒有必然的關係，但實際上想維繫舊的骸骨，抨擊新的藝術的開展。

顯然的，這兩者是同樣的犯了主觀的錯誤；後一派是根本不相信唯物史觀，前一派是忽略了唯物史觀的歷史性。

政治法律思想文藝……俱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牠們必然的隨着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這是沒有問題的；同時，牠們也必然的是階級的。可是牠們本身的演進，也正和社會經濟的演進一樣，是有一定的階段，並且有一定的基礎。譬如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是因了牠承繼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集中以後，已經有了社會生產的形式，然後方有可

能。並不是搗碎了資本家手上所把握的生產方法重新能創造另一個新的社會。同樣的，未來的階級文學，也並不是打倒了舊的一切文學上的技術而另成一種非凡的文學。因此，新的文學者除去致力於他的集體主義的文藝之外，他對於舊有的文學，至少要有以下的幾種態度：

一、承認舊文學的存在，而分析牠的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指明其階級性。

二、普及民衆教育，提高其文藝興趣；將少數人所把握的藝術奪給大衆。

三、重新估定其藝術的價值，給舊的作品一個正確的評判。

固然，我們承認文藝作品是帶有階級的宣傳性，牠的鼓動能給人以極大的影響；可是我們祇要給讀者一種歷史上的認識，舊的意識的惡影響是無關緊要的。並且，我們雖然否認文藝有獨立存在的可能，但我們可以抽出一切文藝共同的優點，便是文藝中包含一種『社會心』——便是社會中人類相互保持着的一種愛他的道德。自古以來的文藝家，常是叫出他那一個時代人類的苦痛和悲哀，便是這種最低限度道德的活躍。

不過那種所謂『社會心』的東西，也常是因了時代的不同而外發的形式不同，我們如早不能辨別這個，那我們便不能將『幻想的』和『科學的』兩種相對的東西分割開來。譬如我們看到老子上面的『民老死不相往來』的一節，不能便確定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同時，我們不能因了禮運上有『大道之行也』的一段，便說中國老早有『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正是爲了時代的不同，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的人類的意識是不同的；那麼，他們思想的出發點就當然不同。在過去，有很多整理舊文學家作品的文人，爲了要抬高他那崇拜的作家，便將許多新的思想新的術語附會到古人身上去；或是爲了對目下時髦的某某主義投機，便硬拉了些古人的警語來引證；俱是不合理的無聊的行爲。自然，那些人所知道的是功利，他們根本便不能瞭解新舊思想各個的本身價值，與其價值的判別；他們爲了自肥，死人和活人的價格是相反爲用的。

另一方面，在一般所謂極左派的新的文學者，他們用了白熱以上的情感去歡迎革命，他們知道社會必然的趨勢，他們同情（或者是參加）於被壓迫者的解放運動。他們

深『害怕』舊的文藝怎樣傷害了新的進展，於是便將舊的文藝一概抹殺，漫罵舊的文藝是如何地無聊。但舊的文藝終於是『有過』；新的文藝究竟是怎樣形成，什麼格式，一般的讀者，還尚未『見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讀者們祇覺得無路可走，而新的文藝成了一種幻想，即使是試行創作，事實上不過測驗他自己離這幻想還有多遠？因此，他們雖曉得科學的理論是怎樣地應用，而結果他們的態度，却反陷於主觀的謬誤而不自覺。由此我們知道，新的努力是我們應有的責任；然而除此之外，凡社會上『有過』的現象，『有過』的事實，我們不能漠然視之，籠統地否認一切，打倒一切，或竟以某種威權來壓迫一切。這正因為愚民政策，是比較任何政策都要笨拙的政策！

李白的詩是『有過』的事實，不但從前是『有過』，而且現在還有——就在目下的新詩作品裏，李白詩的精神還沒有死——在這個年頭兒而來談什麼李太白及其詩，雖『內省』是一個自己窮極無聊的結果，但畢竟是『有過』，於是便有了這篇文章，結果也祇得希望牠是『有過』。本來，在鬥爭尖銳化了的現在，這些文章原不是什麼了不

起的武器

二

在自稱龐大的中國國內，總是算不會有一部文學史；因為在研究國故的中國學者，他們正確的歷史眼光是沒有的。他們除掉抄襲日本的『支那文學史』外，便只有用英雄主義式的選擇，去整抄歷代文人的詩文了。他們一點也不曉得所謂『名人』是怎樣在那時代裏養成的，更不知道文藝上的變革有什麼必然的原因。換句話說，他們是太注意了文學家本身的所謂『天才』，而忽視了文學家在那時代裏活動的狀態。

一個名字極響亮的文學家，他必然的是那個時代裏一派相同文學傾向的總代表，而且他那時的文學必然在一個變革當中。用一個顯明的例子來說，如胡適的提倡白話文，並不是先有胡適而後有白話文，事實上是先有了白話文的新潮的傾向而後才有胡適的提倡。因此，胡適不過是在提倡白話文時當了一個大代表。

當一個極盛的文藝思潮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她正和社會的經濟制度一樣，牠本身便慢慢地發現了很多的矛盾，由是而腐化而暴露出牠本身的許多流弊。結果，必然產生出一種反動的文藝思潮——但牠是適合於那時代的——由漸變或突變的方式來代替了舊的文藝。於是在所謂『時勢造英雄』的形式之下產生了偉大的作家。

李白，便是這麼一個偉大的作家的代表。

中國到春秋列國時代，那時的封建社會本已在破落中；因此，在思想上，文藝上，都有了極活躍的趨勢。就是在民間，依舊是保留了不少的民間文藝。但那個時代因了經濟條件的不足，於是便給野心的政治家築就了二千餘年特殊封建社會的基礎。在學術方面，『文以載道』的傳統文章便被重視；在文學方面，便漸次成了貴族階級的專有品。漢魏而後，一般優閑的貴族，便殫盡心力，在那裏研究聲律，競麗詞華；於是文學不僅是脫離了民衆，脫離了人生，而且脫離了情性了。這種流病，一直到了初唐，在所謂『王楊盧駱』以及沈佺期宋之問等大文豪，都競以律詩相尚。散文奏議，也都以綺麗的四六駢句爲工穩。

中唐而後，經過了武后的爭權，吏治的腐敗，人民生活的痛苦加深，而內亂亦因是蠭起。於是這一時代的特殊封建社會組織，又發生了暫時的經常期的動搖；這種動搖反映到人民的意識上，便是出發於個人主義的浪漫精神擴大，拘束於常軌方面的行動減少。同時，反映到文藝方面的，就是對傳統的文藝技術懷疑；常想脫離一種形式的束縛而趨於內在的實際的創造。但這種創造因為沒有一種未來的標準，於是便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過去的黃金時代，而走入了復古運動的一途。可是這種『復古』並不是完全『開倒車』，因為這時文藝家所模擬的僅是一個古時的方式與其賦有的精神；而其內容則因為所根據的社會環境不同，牠實際的內含是不同的。更明白的說，那種復古對於那時代的一般舊文學，是進化的而非退化的。這不僅在中國的唐代是如此，歐洲中世紀後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是如此。

唐代在文藝上的變革，有兩個總代表的作家——詩歌方面推中唐李白；散文方面推晚唐韓愈。但他們兩人俱不是澈底的革命者，所以一般的封建觀念，在他倆還是很深。

尤其是韓愈，他在散文上的變革是比較切近了實用，比較靠近了人民，但他的思想，不僅沒有脫掉了傳統的儒學觀念，所謂『文以載道』的信條，且因了他更趨於穩固。這一點李白是比較好些。李白詩不僅是在表面上擺脫了拘束，就他思想的內容，也能敢於懷疑一切，而且敢於表現出來。

李白對於純尚詞藻聲律而沒有內容的舊詩，是絕對使用了一種革命的形式。（但文詞華美而兼有意境者，不但不爲白所遺棄，且爲其師宗，當不在此例。）他這種勇敢的革命，我們當然不能說是他的傑作；在事實上，因爲當時文藝界裏已有了這種革命的空氣，然後才有李白的努力。我們舉例來證明，如李白的同鄉陳子昂，在蜀地算是李太白的老前輩，他看見了初唐時詩歌的頹風，便早在那裏發牢騷了，他說：『僕嘗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興寄都絕，每永嘆而思故人，風雅不作，是爲耿耿耳！』他這樣憤慨的話頭，直欲革齊梁之俳優，而上追風雅之質樸，其立論當爲前驅者的見識。據我們的推測，當時有這樣的論調，定不止子昂一人；但子昂不是一個特長於詩的人，其餘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詩。

人；所以一直到了李白，纔能拿出他自己把握着的建設，去摧毀那種豔薄的莠種——他便集了這一派新潮之大成！同時，他確是在這一個變革之中，盡了他所重負的文藝上的歷史使命。他對那些舊詩的攻擊，如：『梁齊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說，『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俳優哉！』在他的古風裏，也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之句。可見他一方攻擊別人，一方面他便以改造自任了！他言行的一致，不得不使我們欽佩他體魄的偉大！

韓愈於散文上的變革，人家稱他爲『文起八代之衰』，但他變革動機的起源，却對於李白的詩有不少的受動，所以他在他的詩裏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即其例證。

杜甫在那時雖與李白同時，然而他的出仕却在李白罷官以後，他們兩人環境的不同，使他們的作風有極大的差異。在杜甫的詩裏，雖然去掉六朝以來綺麗的習氣；但他對聲律則奉守惟謹。杜甫詩中對於『君恩』差不多是寢漬不忘，雖有時冤屈被謫，而他的

忠君憂國之情，彌曲彌深！因了這兩種原因，於是使後人發生了杜優於李的論調，實非平允。在李白的態度，對於律詩是十分不高興的（雖然他時被逼於環境也做出幾首好的律詩來），所以他對於極好的朋友杜甫，也差不多用了他革命者的態度了。他譏嘲杜甫的詩說，『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足見他對苦做的詩歌的非薄了。假使他死後還知道有人評杜甫氏『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爲千古絕作，他一定會怒髮衝冠了。

李白對於專制的帝皇是懷疑的，而且他對過去的帝王下了不少的掊擊。他在淫暴的帝王專政制度之下，當然不能對當時的皇帝表示反抗，於是他便譏誚歷代人臣的愚忠——對屈原李斯伍員李陵陸機等的不得其死，數致惋惜——而暗示出個人專政的種種罪惡。他晚年的出佐永王瑒我們且不問他有沒有被脅迫的情形在內；但我們大膽的說一句，李白對君主的愚忠是沒有的！他自己的忠忱，祇有對『天』是如此——這是表示他願爲天帝而爲黎庶努力——他的志向乃在救民。總之，他的佐永王瑒和後來柳

宗元的坐王叔文黨，是同出一轍的動機。

他的嗜酒與求仙，是深受了阮嗣宗輩的影響。阮嗣宗生於亂世，常懷殷憂；他深深地理解有見識的文人在亂世之中是難保全生命的，故他不得不藏於酒，不得不以仙術自騙，而作詩亦似無所指；實則在晦澀的詩篇當中，不知傾瀉了好多年騷了。

因為道學仙術和李白詩發生了關係，於是道學仙術便跟着李白詩跑遍了人間——至今民間尚保留了極多的李白的神話，這未嘗不是李白詩在中國土地內撼動了一種成績。因為李白詩和酒有了關係，於是知道有酒的人便知道有李白其人。甚至於幾歲的孩子，都能謔出『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的句子來。出過門的人，即使是鄉愚，都知道發『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慨嘆。最有意義的，便是到了朝廷失政（甚至於是現在的所謂政府），人民苦於暴征苛斂，而感覺到天下大事無從問起的時候，便會跑到『太白三杯』或『太白遺風』的酒店招牌之下，暢飲其『三杯』了。

這些瑣碎的事實，不是無意義的。